

12

1991

WENSHIZHISHI

中华书局



文史知识



医药学院610 2 01472129

文史知识

1991年第12期

(总第126期)

·治学之道·实与冷

——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两点体会

蔡美彪 3

·文学史百题·新儒学与清代小说

董国炎 8

·历史百题·西晋政治与放达之风

孙立群 15

诗 钩深索隐 以《易》明心

——谢灵运诗《登池上楼》意旨探微 于春海 于衍存 22

骈文早衰而清音独远——读王勃《滕王阁序》 刘尚林 25

沉郁的忧愁 从容的逃难

——读周茂源的《鹧鸪天·夏雨生寒》 赵静涛 30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2)·

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

——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举例 瞿林东 33

文 足衣种种

王作新 40

化 古代的烟花爆竹

白云涛 43

史 “十二金钗”事义本原

——兼说中国古代女性高髻风俗 五维舟 47

知 明清县衙主要建筑的功能

刘鹤九 52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纪念《中国文学史纲要》问世110周年 李明滨 55

图书资料

•《儒林外史》人物论(6)•

“胆小有钱”的严监生

陈美林 61

人物春秋 处世多磨难 身后有是非

——蔡邕其人其事

陶 易 66

一生肝胆如星斗——北宋诗人苏舜钦及其创作

张 晶 72

蝉与中国古代文化

张乃格 76

语言知识 说“盲人骑瞎马”的“瞎”

方一新 82

说“倒过醮来了”

伍翰仁 83

• 中国名著在国外 •

彩石光珠从古重——《红楼梦》在缅甸的流传

胡文彬 85

读书札记 也说“画虎类狗”

今 朔 89

乾隆皇帝与《贰臣传》

杨 钊 91

• 青年园地 • 对“郑声淫”的重新审视

张小平 94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也说“毕月乌”

吉发涵 99

• 文史信箱 • 古人的室名

曹 之 104

• 文史研究动态 • 四十年骆宾王研究概述 俞樟华 梅新林 109

1991年《文史知识》总目

116

《文史知识总目录》(1981—1990)征订启事

127

• 补白 4 则 • 中国古代的契约(21) 郑板桥书画要现银(29) 《三希堂法帖》(81) 《旅游知识大观》即将出版(84)

内乡县衙平面图(封二)

二十八宿图(封三)

实

与

冷

· 治学之道 ·

——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两点体会

蔡美彪

范文澜(1893—1969)是我国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一。所谓最早,即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那个时代。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家的共同特点是,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已经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作过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把他们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新境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年代,范文澜曾在蔡元培、陈独秀主持的北京大学文科,受学于黄侃、刘师培等大师。抗日战争以前,他曾先后撰著《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名著出版,研究范围涉及经学、史学、古典文学等广阔的领域。1940年他去延安,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中国历史,编成《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下三册,陆续出版。下册,以后改题为《中国近代史》流传。此后,他的主要研究工作,即在于历史学方面。我从1953年才开始随从范老工作,没有能力全面论述他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只能就他的治学精神,说两点体会。

第一是实。研究问题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各种流派的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1961年3月,范老在纪念巴黎公社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讲演,力倡实学,反对空疏。他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写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具体,非常扼要,许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就是从这些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我们有些史学工作者,不能说他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动起笔来,却把历史事实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懒

得作调查工作，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说这就是论文，这就是著作。”范老这些犀利的语句，有如针砭，是有所为而发的。当时是在“大跃进”之后，有些史学工作者不免沾染了虚浮之风，疏于务实为喜发高论。范老的讲演，切中时弊，后来题为“反对放空炮”，同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在这篇讲演里，范老还依据他自己的治学经验，概括地论述了研究问题所必经的过程。他认为要写出好的历史著作或论文，“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写文章不是因手痒了，嫌纸太多了，而是要解决某个问题，所以必须坚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老实态度。切忌临时抓夫式的搜集材料，杂七杂八一大堆，好像一篇狗肉账，使读者摸不着底里”。又说“精是指放弃放空炮的恶习，切切实实，老老实实在地做调查工作(其中包括系统地读书)，开动脑筋，想想问题的性质，付出仔细研究的劳动，然后再写文章”。他在这里讲了工作态度，也讲了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先了解历史的实际，但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许多事件并没有完整的纪录，有些虽有丰富的资料，但由于资料来源不同，以及纪述者的偏见，往往并不能反映历史事实的真相。这就需要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接近历史实际。范老一再提倡系统地读书，从头到底读书，也是有所感而发。因为人们由于急于求功，往往先有某些概念，然后查找有关资料，以“寻章摘句”的方法，摘录有关文字，然后联缀成篇。这样的工作方式，虽然便捷，却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历史文献的内涵，更难掌握历史的实际。范老要求人们切切实实、老老实实在地读书，就是期望人

们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探求历史实际只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由此出发，还需要进行理论性的分析、综合与概括。对此，范老拈出“平实”二字，即力求持论平允，合乎实际。这当然也不是容易做到的。历史环境与各种历史现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要做出平实之论，谈何容易？在研究工作中，稍带主观性、随意性，便不免失于平允，流于偏颇，也就难以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倘若主观上即追求新奇，就必然去实际更远。平实并不是否认创新。对于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是一种创新。对前人的不平不实之论，使之更加切合实际，或者较前人更为深入实际，揭示本质，当然也都是创新。范老生平有不少新说，大都是产生于对历史实际的理解，创为新说，以求合乎实际。例如，1954年他曾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见《历史研究》第三期），提出汉民族在秦汉时已形成为民族的新论。此说的提出，突破了斯大林民族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也正由于此，此说一出，批驳之论即接踵而来，但范老仍处之泰然，因为他自信其说基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并与汉民族的实际状况相符合。关于汉民族的形成，至今仍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但这一事例足以说明，范老是把创新与求实融为一体，由求实而导致创新。在历史研究中，是否合乎历史实际应是检验新论的唯一标准。倘若脱离实际，只求概念的新颖，并不能称为创新，而只能算是“标新”，是经不起实际检验的。

综观范老的治学精神，是十分自觉地贯彻了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他关于治学的言论，力倡以老老实实的态度，从事切切实实的工作，对历史事实进行平实的分析，以求达到合乎实际的结论。从工作态度、方法到目标，都贯串着一个实字。他平生的学术著述，也都是内容丰富的实学。他的治学经验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胸中常存实字，才能避免走入歧途，也才能做出实际的成果。

第二是冷。范老曾有“二冷”之说，在学术界流传甚广。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所作的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曾对此有所说明。他说：“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可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工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请你去吃冷猪肉，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我这样说，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愿意提出我的建议。”他的冷猪肉说，曾被斥为“尊孔”而受到指责，其实不过是冷板凳说的引申和补充。坐冷板凳的本意是劝人“苦苦干，慢慢来”，埋头苦干，坚持不懈。历史研究既然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只能从实际出发，就需要长期艰苦的工作。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是难以奏效的。范老提出坐冷板凳，并非只是劝谕别人，也用以要求自己。建国以后，他年事渐高，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读书和写作，直到日暮，方才离去。数十年如一日。范老身体力行，为后辈做表率，对于建立近代史研究所的学风，起了重大的作用。

坐冷板凳的另一个意义，是劝人专心致志，不慕虚荣。研究历史需要广博的知识。青年时期知识积累不足，进入老年，又会感到时间不足、精力不支。在人的一生中，具有研究条件又有充沛精力的年月，其实是很短促的。如果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追求一时的浮名虚誉，便难免光阴流逝，白发无成，务虚名而受实害，损失是无可弥补的。范老告诫人们，不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并说这“可能不合时宜”，但这正是他语重心长的经验之谈。范老一生，淡泊自处，视名利如浮云，是人所共见的。但他仍然感到集中时间与精力的迫切。建国以来，他多次悬辞领导职务，对于可做可不做的事，尽力辞谢。一次会上，他自称“日暮赶路程，欲进足不前”，大家听了，无不为之感动。他劝说人们坐冷板凳，就是要甘于寂寞清冷，专心致志地从事严肃的科学工作，以期做出更

多更好的成果。

范老提倡的冷，还有一层意思，即研究历史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冷静的客观的分析。人们对待历史现象，难免带有主观的因素和感情的成分，但要得出具有科学性的合乎实际的结论，就需要摒弃个人感情的好恶，冷静分析客观事物。例如，对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人们当然满怀同情与钦敬，但要像范老所说：“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就不能只是满足于热情歌颂，而需要冷静地考察它的一切方面和整个过程。同样，对待其他任何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也都需要冷静的分析，才能洞察历史的实质。又如史学工作者往往由于自己发现了一条新材料或研究了一个新问题，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过分强调这条材料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不能放在历史的全局中作恰当的估量。这也是由于夹带感情的因素而有失冷静的缘故。研究历史，只有埋头苦干冷静分析，才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与冷又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融通的。

前些天，在《人民政协报》读到一篇文章，说范文澜先生曾建议“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者的引述完全出于好意，但似得自失实的传闻。据我所知，这并非出自范老本人，而是历史界的一位先生，依据范老所讲的意思，撰为此联，说是为了自勉。不过，范老所说的坐冷板凳，原是指埋头苦干、不慕虚荣的治学精神，与“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之义不同，似不宜限以十年。求实也是治学的精神，“不写一句空”便不免有些绝对化了。但就其实质而论，也还是不悖原旨的，



新儒学与清代小说

·文学史百题·

董国炎

儒学发展到清代，有了质的变化。变化的特点是激烈批评宋明理学，同时又从根本上维护儒学，故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颜元说：“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习斋记余》）又说：“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习斋年谱》）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颜元、李塨学派是“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新儒学其他代表人物如顾炎武、周谷等人，莫不具有这类思想特点。

新儒学的出现，有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封建社会后期各种矛盾激化，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吏治队伍水平低下，军事组织无能，为民族提供精神产品的文人阶层颓唐，很多人堕落，等等。这种时代背景要求下，发生了对传统儒学的质的改造。与佛家、道家、玄学、宋明理学乃至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比，新儒学要求发扬儒学真义，经世致用的个性是鲜明的。新儒学对本世纪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也很有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流派。

然而新儒学在清代遭际多艰。旧理学尽管已失去光彩，在思想史上已无甚价值，却得到统治阶级扶持，从李光地直到曾国藩，旧理学获得达官显宦之标榜。相反，新儒学遭到统治阶级冷遇，常被看作异端，蒙受打击。学说不易合法传播，常以隐秘方式流传，真面目若明若暗。与此同时，小说至清代可谓普及社会，一些喜爱小说又接受新儒学的文人，借小说抒情怀，写理

想，寓褒贬，于是有种种新儒家之言反映到小说中，成为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值得注目的独特现象。

颜李学派与《儒林外史》

颜李学派兴起于清初，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宋明理学的弊端，提出一整套改造社会的方案。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这套方案也即“礼乐兵农教养”方案。兵农两事解决均田和武备，让社会安定，国力强盛。教养则先是养民，使百姓得其所，再施教化，使百姓知礼仪，于是太平盛世可求。这个方案的执行要靠官员队伍，但八股科举制只能造成文人和官僚堕落无能，因而取消八股科举，代之以礼乐修养和乡选里举，成为整个方案的首要步骤。

颜李学派很强调实践，但在清代社会，他们的方案不可能得到实践。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艺术地反映了颜李派的社会批评和社会理想。这对颜李学派来讲，堪称悲凉的安慰。吴敬梓与颜李学派颇有渊源，从其曾祖吴国对至他的长子吴烺，均与颜李派人物有过交往。他本人与颜李学派在南方的代表人物程廷祚（绵庄）是好友。梁启超称程廷祚为“服膺颜氏学且能光大之者”。吴敬梓与程廷祚过从密切。他很推崇程氏，并由“绵庄”二字生出化名，写成《儒林外史》中理想人物庄尚志。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属社会批评，一部分属社会理想。作品对恶浊世风、黑暗官场，特别是八股制度和八股文人的揭露讽刺，深刻犀利，入木三分。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监生、严贡生等人物，写得脍炙人口。这类批判性内容，与颜李学派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是一致的，但并非仅仅来源于理论。因为吴敬梓本人，作为一个落拓潦倒的下层文人，对上述社会弊端，有直截的痛切的感受。有客观

现实为基础，思想批判才能脚踏实地，艺术批判才能活灵活现，血肉丰满，二者的统一也才能成功。这部分批判性内容，读者比较熟悉，有关论述也很多，本文就不再赘论。

小说的另一部分内容，属于正面的社会理想，让一批正面文人在小说中实践“礼乐兵农教养”方案。这些正面人物主要有庄尚志(绍光)、虞育德(果行)、迟均(衡山)、杜仪(少卿)、萧采(云仙)等。这些名字都富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微言大义。他们不慕荣华富贵，品德高尚，一意讲求大道。小说称赞他们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而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李塔本人“最喜欢说兵农礼乐水火工虞”。小说第24回之后，笔调开始变化，讽刺笔墨大为减少。因为正面人物纷纷登场，小说笔调转为直陈激赏。写杜仪是一片褒奖，写庄尚志，是喜悦钦佩的抒情写法，写虞育德，用了一整回篇幅介绍他的高风亮节，胸襟抱负。故卧闲草堂本评语说：“此篇纯用正笔直笔，不用一旁笔曲笔。”

正面文人倡导礼乐，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修建泰伯祠、祭典泰伯活动。泰伯是周代贤人，最讲礼让。小说尊崇泰伯，一是针对恶浊世风，做道德针砭，一是通过祭典，实际学习古礼乐。杜仪经济窘迫，但一听说要建祠，竟变卖住房，捐银三百两。迟均反复论述建祠的意义，对学习古礼乐的作用，抱极高期望——“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好助一助政教”。泰伯祠被写得极其雄伟壮丽：几十层高坡上去，一座大门，大门过去，一个大天井，又几十层高坡上去，才是雄伟的大神殿，殿后有五间大楼，悬着“习礼楼”匾，也属点睛之笔。祭典礼节复杂，突出古礼古乐，突出颜习斋强调的实习态度。不厌其烦，详尽写出各人的职责，站立的位置，掌管的器物。怎样走路，怎样奏乐，怎样行礼，都清晰详明。这件事里，大批正面文人目的明确，态度认真，推行礼乐，想以道德改造社会。这与小说中的卑浊人物、讽刺对象，构成鲜明对比。小说还作了声势渲染，写百姓们扶老携幼，夹道观看这些救世文人。百姓们欢声雷动，称颂主祭者是

神圣临凡，仿佛世道从此要变，要回复上古之淳正儒雅。

庄尚志才学品行极高，他不肯走科举道路，因受到推荐，被征辟入京。他细细做了教养十策进呈皇帝，如果这教养十策被采用，天下大治是有希望的。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以乡选里取代八股科举的愿望。萧采治理青枫城，是对兵农教养理想的实践。他是文武全才，带兵收复边陲青枫城之后，就召集流民，分配土地，垦荒修水利，栽种果木，获得大丰收。又教百姓祭典神农，行三献八拜之古礼。更兴办学校，教育儿童，尊崇文人，使得战乱之余的边陲地方，居然成礼仪彬彬之邦，安居乐业之乡。此外，又有郭孝子寻父，是“孝”的示范；杜仪做《诗说》，重新解释《诗经》，批驳宋儒旧说，是“正大经”的示范。这一系列情节和高人逸士，构成作品的肯定性内容，与作品中被批判被讽刺的人物事物形成对比，相互依存。

毫无疑问，小说的批判、讽刺部分写得很成功，而正面倡导的东西，多数显得生硬牵强，苍白无力。但若对后者视而不见，把这部作品简单地称为讽刺小说，则有失片面了。文学作品有多重价值，《儒林外史》的思想史价值不容忽视。而儒家思想竟要靠小说来传播，恰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小说地位的提高。从艺术上讲，《儒林外史》的得失很富于启发意义。小说中的肯定世界，不少地方具有理念图解的色彩，不管作者怎样向往这种理想，脱离现实土壤的虚幻愿望，结不出丰硕果实，理念图解永远是苍白无力的。我们这样讲，主要是艺术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对作者的指责。事实上吴敬梓本人已经意识到现实的严酷制约，故尔一方面宣扬理想，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理想难以实现的悲凉困惑，特别在小说结尾处。作家作品这种复杂性，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等等，都很值得后人研究。

太谷学派与《老残游记》

太谷学派是个很特殊的思想政治学派。同治五年(1866)黄崖

山教案中，太谷学派遭清廷屠杀，两千数百人死难，堪称中国思想政治史上令人震惊的事件。太谷派领袖周谷，字太谷，号空同子，道光年间讲学扬州，被两江总督指为异端，逮捕下狱。周谷死后，弟子张积中和李光炘张大师说，发展为南北两派。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讲学，信徒日众，文人居多。他们建立山寨，设文学房，武备房，耕读讲学，财物奉公，仿佛一种特殊的乌托邦村社。他们的讲学礼仪隆重，内容秘不外传，受到清廷怀疑时，张积中态度强硬。清朝大兵攻剿时，张氏合族“男女均焚诛，合寨死斗，无一生降”（张曜《黄崖教匪》）。死亡人数，一说达万人之多，北派基本被消灭。

李光炘在泰州讲学，影响也很大。其学说兼采佛道之言，而以儒为主，但对孔孟之后儒家各派均予批评，尤其激烈批评宋儒。太谷派重《易经》，结合儒家民本思想，推衍一套宇宙人生观念，富于进取精神，强调实行。他们也强调礼乐兵农教养，但轻重缓急不同颜李学派，不再把礼乐道德摆在首位，而更重视实际的社会症结。他们想以“复井田”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黄崖山耕读就有某种实验性质。李光炘死后，重要弟子黄葆年、蒋文田、刘鹗、毛庆蕃等以教养两途分责。1902年刘鹗给黄葆年的信中说：“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同为空同之子孙，同培古今之道脉，同身同命，海枯石烂，无有贰心。”（《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

刘鹗以养天下为己任，他经营实业，富于才干，精力过人，先后行医、治河、开书局、办商场、办制盐公司、经营地产；又筹办电车公司、自来水厂、钢铁厂、船运公司；还倡修京镇（镇江）铁路，各地奔走无宁日。其间挤出空隙时间，写成《老残游记》。此书内容相当复杂，揭露所谓清官的残酷和种种社会黑暗，相当深刻，故被称为“谴责”小说。但实际上，书中特有的太谷派新儒家之言，不可忽视。小说一开始，就用大船航海来象征当时

中国国情。大船已腐朽，又满载乘客，本有覆灭的危险，舵手水手却不负责任，还乘机抢掠乘客。他们象征清廷及各级官吏。乘客中有一批人，煽动大家杀舵手水手，搞得船上大乱，时刻要翻船。他们象征革命党。老残表示，对这两类人（即顽固派和革命党）都不赞成，打算阻止这两种人的做法，还要送一只罗盘给大船定方向。据这象征笔墨看，他似乎是个改良派。但书中并不宣传改良派思想。刘鹗本人给黄葆年的信中，还痛斥过“康梁之徒”。他们确是个特殊的思想政治派别。

小说第8至11回，借屿姑和黄龙子论道，正面表现了太谷派之言。他们是住在山东桃花山的一批神秘隐士中的两人。他们对古今治乱，天下大事，有一套成熟看法。他们肯定儒家，推崇《易经》。强调“各宗教家的书，总不及儒家的《易经》为最精妙”。但对儒家内部，他们又有激烈批评——“只是儒教可惜失传已久。汉儒拘守章句，反遗大旨。到了唐朝，直没人提及。韩昌黎是个通文不通道的脚色，胡说乱道！”“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他们对当时的北拳（义和团）南革持否定态度，又用《易经》治乱祸福相伏相依的思想看待北拳南革，说天下将经大乱而后大治，最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駸駸进于大同之世矣”。

由重《易经》取代重礼乐，《老残游记》与《儒林外史》的差异，客观上正反映了新儒家一种倾向性转变。实际上直至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仍有吸收佛学，以儒为本，以《易》为宗的特点。社会发展至近代，再把古礼古风奉为救世良药，实在于事无补。放弃古礼乐，辩证地考虑社会问题和安身立命态度，不失为新儒家睿智的改辙。小说中的老残，精通多种实学。他还有一批神秘的朋友，“讲舆地、讲阵图、讲制造、讲武功的，各样朋友都有”。《儒林外史》中的大部分贤人，所长只是道德情操，所懂只是古礼乐，却并无实际谋生本领。老残一派人物，本领强多了。事实上太谷派的组织能力务实能力，远较颜李学派或其他学派强。特别是黄

崖山教案中，事前大批文人远道举家来归，倾尽家财奉教；事发时慷慨就死，无人乞降；事后余脉不绝，确为思想史上其他派别不及。可以说，在纵向比较中，新儒家更成熟更有力了。

然而，《老残游记》中又流荡着一种真实感人的悲凉意绪和人生困惑。此书一集的作者自序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二集的自序更说，人生如梦，一切虚幻。这种悲凉困惑，已经超过《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写到后来，贤人们风流云散，泰伯祠满目尘封，荒芜破败，一派凄凉的变徵之音。这是因匡世方案难以实施而发。而《老残游记》中，只是闪烁地反映太谷学派的人物和见解，却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造社会的方案。主人公老残，只是作为一个特殊人物，到世界上来走走，做些事情，发些感触，甚至也寻些消遣。老残曾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到国家、时局、人生、岁月——“岁月如流，眼见斗柄又将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这与黄龙子论道所发的乐观议论，形成强烈对比。可以说，感觉与理念之间，已到了感觉凄楚而实在，理念昂扬却飘渺的境地。

《儒林外史》到《老残游记》，表现出越来越浓重的悲凉意绪和沉郁困惑。就实质来说，这是新儒家的困惑。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是合理的，新儒家也越来越成熟了。但是社会不停向前发展，新的历史要求已经提出，新的政治派别已经占据舞台。在新的时代里，新儒家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落伍者，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自己的脆弱无力。《老残游记》那条象征性的大船上，革命派与顽固派激烈斗争，却不容老残一流人置喙其间，想用罗盘给船定方向，反遭一顿痛打。这象征正是对现实的痛切感受。应当说，这些虚构的形象和情节，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非常深刻的史料价值。而与此同时，它们的审美价值，更是真切感人的。那种将个人与国家社会溶为一体的儒家文化精粹情致，那种凄凉的哀美，具有长久的感染力。如果我们仅仅注意这些小说中的讽刺韵味和谴责技巧，那么我们的审美感受力将流于浅显。

西晋政治与放达之风

1 西晋是我国古代短命的王朝之一。它公元265年建立，280年灭东吴统一全国，仅维持了十余年安定的局面，到291年便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在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厮杀中，西晋政府失去了对全国的有效统治，终于走向覆亡。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社会风气败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使早已觊觎中原的北方民族乘虚而入，这些都是西晋国祚短促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造成西晋灭亡的诸多因素中，社会风气与西晋的衰亡有密切的关系。社会风气是一个时期的社会时尚，在西晋最时髦的便是放达。所谓放达，即“以放任为达”，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是这样描绘晋代的放达之风的：

今晋之兴也，……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认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机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

如何看待晋人这一特有的精神风貌呢？我们认为不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作具体的分析。因为这时曾出现过两种不同含义的放达，一为竹林之放，一为元康之放。

所谓竹林之放，是指魏晋之际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们，对司马氏把持曹魏大权，并企图取而代之的行径十分不满，他们不愿意与之合作，也无力进行公开反抗，为了躲避司马氏的陷害，他们“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思想上主张“越名

教而任自然”，生活上追求远离政治，自在逍遥。于是，他们“口不臧否人物”，吃药饮酒，清淡玄学，行为乖僻，潇洒脱俗。嵇康、阮籍等人是以表面的放达来解脱内心的苦闷，用怪诞的行为来宣泄对司马氏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讲，始于正始时期的竹林之放固然有不少消极因素，但仍不失在司马氏高压政治下保全自身的一种办法。而且就他们在种种放达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和肯定而言，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然而，随着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西晋，以及他们不断推行屠戮士人的高压政策，一批又一批的士人被送上了刑场，嵇康被杀，阮籍郁闷而死，以放达著称的竹林名士也开始分化，有的入仕，参加了司马氏的阵营，有的更加消沉，终日以酒为伴。于是，竹林名士们的那种企图保持相对独立人格，不肯与当政者合作而与之周旋的放达，逐渐为游戏人生、专营财色、醉生梦死、甚至不顾羞耻，公开淫乱的放荡所替代，这便是西晋时期的元康之放。晋人戴逵曾这样评价放达之风的演变：“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晋书·戴逵传》）戴逵所说“有疾而为颦者”，是指竹林名士内心极其痛苦，放达乃不得已而为，“无德而折巾者”，则说元康时期的士族东施效颦，以放达为名，行享乐、放荡、淫乱之实，已毫无积极意义可言。

可见，无论是颇有特立独行精神的竹林之放，还是一味追求享乐和感官刺激的元康之放，都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尤其盛行于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更是西晋腐败政治的产物，而放达之风的蔓延又使西晋王朝更加黑暗，如此恶性循环，终于使西晋陷入灭顶之灾。

2 司马氏是在士族官僚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取代曹魏建立西晋的。西晋政权集中代表了士族大地主的利益，司马氏为了换取士族的支持，从各方面满足他们的特权要求。如在经济上颁布占田荫客制来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则由门阀大族把持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使高门士族及其